

新制度經濟學前沿

◎ 李增剛

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7); 張宇燕等譯:《新制度經濟學前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3)。

由我們翻譯的《新制度經濟學前沿》一書終於出版了,一方面這本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早該翻譯出版;另一方面是我們的翻譯前後拖了一年多才完成。這本書是華盛頓大學在1995年3月為紀念道諾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榮獲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召開的一次研討會的論文集。在這本書的引論中,兩位主編德羅布克(John N. Drobak)及奈(John V. C. Nye)歸納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四個研究領域:交易費用和產權;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數量經濟史;認知、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作用。全書共分為四部分,有十四篇文章。

該書的第一部分包括兩篇文章,是1993年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諾思和福格爾(Robert W. Fogel)——的論文。諾思在緒論中回顧了自己的學術歷程,並特別介紹了他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原因,以及每一個時期關注的主要問題。福格爾在〈道格拉斯·諾思和經濟理論〉中,中肯地評價了諾思的經濟學貢獻,使我們能夠更加準確的把握諾思在新制度經濟學、甚至整個經濟學中的地位。鑒於諾思的貢獻構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基礎之一,對諾思研究歷程的回顧也就是對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理論發展脈絡的回顧。

第二部分是「經濟史」,包括四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是通過對歷史資料的研究,提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題或驗證已有的結論。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和羅森塔爾(Jean-Laurent Rosenthal)在〈近代早期歐洲戰爭和稅收的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的歷史教訓〉中建立了一個戰爭和稅收的模型,用來分析近代早期歐洲不同國家為甚麼建立了不同的產權制度。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能否建立一項合理的產權制度,取決於該國的財政政策(fiscal Policies),而戰爭是決定現行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經濟增長快慢的關鍵並不在於稅收水平,而在於邊際稅收效應,要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不一定要減稅,而應該特別關注邊際稅率和財政制度給經濟發展造成的障礙。在〈經濟、社會、政治和規範諸因素的相互關係與經濟意義:中世紀後期兩個社會的狀況〉一文中,格雷夫(Avner Greif)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熱那亞商人和馬格里布商人在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差異,分析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社會的效率差別,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了「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路徑依賴性」的結論。這篇文章從表面上看屬於經濟史文章,但是提出的命題是比較制度學的,或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歷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文化價值理念、意識形態傾向和勞動制度變遷:對三者互動關係的詮釋〉一文中,考察了文化、觀念與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某

些方面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行為以及對勞動組織、勞動控制、勞動強制的社會可接受方式及其變化。他得出的結論是：不關注文化價值對經濟行為的作用方式而直接處理傳統經濟問題，可能會使人們誤入歧途。奈（John V. Nye）在〈關於國家的思考：強制世界中的產權、交易和契約安排的變化〉一文中把市場競爭擴展到政治組織理論框架。他首先分析了暴力與市場，認為強制或權力的存在並不足以影響競爭性產出的「效率」或「剩餘最大化本質」，真正起作用的是隨之而來的交易特徵和各種監督成本。在此基礎上，奈提出了一個作為掠奪者和管理者的統治者假說，即代議制政府不僅具有統治的寄生性一面，他們還必須提供公共產品。均衡時的統治者是一個寄生者還是一個管理者，最終取決於政治經濟市場的結構和統治者的偏好。

第三部分是「制度和政治經濟學」，包括五篇文章。其中，兩篇討論產權界定問題；一篇分析公共選擇問題；兩篇研究君主或政府的債務問題。文章的作者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揭示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們對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的影響。奧爾斯頓（Lee J. Alston）、利貝卡普（Gary D. Libecap）、繆勒（Bernardo Mueller）在〈巴西亞馬遜河流域暴力和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遷〉一文中建立了一個框架，用於分析土地產權界定中暴力發生的可能性。他們認為，並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會發生暴力衝突，而只有在土地價值上升幅度較大，例如：與市場距離的縮短或土地租金提高、以至於超過了發生衝突造成的租金耗散時，暴力衝突才可能發生。金·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在〈變更產權：非洲正式和非正式產權制度的協調〉中，通過分析非洲正式土地產權界定中遇到的困難，驗證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符的重要性，並提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是前者成功的關鍵。貝茨（Robert H. Bates）和謝普斯（Kenneth A. Shepsle）在〈時際制度〉一文中建立了一個模型分析時際制度，將人的一生劃分為幾個階段，人類社會的每個時期都是由處於不同階段的人組成的。他們根據這個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以親緣而不是以市場或政府為基礎的社會能夠生產防衛、和平以及安全等公共物品。他們證明，這個模型的一個均衡是，在生產公共物品時，每個人在某個時期之前是賣力的，但此後他將偷懶，即使面臨被驅逐的可能懲罰時也如此。這篇文章的最終結論是要驗證時間對制度制定和實施的重要性。巴里·R·溫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在〈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礎：17-18世紀英格蘭的議會和君主債務〉中考察了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光榮革命」，提出了有限政府的自我實施問題，最終的結論是公民的同意是英格蘭「光榮革命」後有限政府自我實施成功的關鍵。如果說溫格斯特的文章是通過君主債務問題來分析有限政府的基礎，那麼德勒巴克（John N. Drobak）的〈美國的可置信承諾：對逃避公債的實體性和結構性制約〉則主要分析了「法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首先研究了如何運用合同權條款來控制對契約義務的立法性損害，並描述了導致最高法院利用聯邦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限制鐵路債券義務司法性損害的政治和社會因素，解釋了合同權條款原則最終湮滅的原因，得出結論認為：在以法律規則為基礎的市場制度背景下，司法制約只產生了有限的影響。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美國法院之所以對同一憲法條款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解釋，原因就在於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當然也是為了促進不同背景下的經濟增長。

第四部分的三篇文章對國內大多數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學者來說有些陌生，它們是關於「學習、認知和理性」的。克拉克（Andy Clark）在〈認知理性：個人學習和外部結構的相互作用〉一文開篇就提出「理性」是一個不太切合實際的概念，它忽視了人類推理活動的時間和空間特徵。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只有在個人行為受到強外在約束時才是正確的；而在弱約束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甚至完全錯誤。新古典經濟學在「理性」假定方面，混淆了個人認知水平和外部環境約束之間的關係。他最終指出經濟學家重新思考人類心理假定的重要性。在〈超越理性預期：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一文中，阿瑟（W. Brian Arthur）試圖提出

一個觀察經濟世界的特殊方法，即把經濟看作一個由信心、預測、期望、解釋以及基於這些信心和預期的決策、戰略和措施組成的集合。他認為，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假定在現實中非常脆弱，因為每個人的計算能力不同、邏輯推理的結果也不完全相同。為了分析預期的形成及循環過程，阿瑟考察了股票市場上的價格形成過程，並在計算機上進行了金融市場模擬。他得出的最終結論是：在實物經濟背後，指導它們並被它們指導的是信念，這些信念可以相互加強，相互競爭。在經濟活動的最重要部分，這些信念不可避免，世界也因此而變得多彩多姿。在歷史上，信念和行為不可分割，它們的交相呼應產生了複雜的恆動模式。也正是這種相互影響的非均衡信念才使世界變得絢麗多姿。戴維（Paul A. David）和桑德森（Warren C. Sanderson）的〈利用不可靠建議：認知進步、貝葉斯調整和不可靠知識的韌性〉一文通過對人類在錯誤知識指導下採用安全期避孕方法效果的計算機模擬考察，論證了在難以控制且不可完全觀測的隨機過程進化中，人類的學習行為和認知理解（及誤解）所起的作用，其結論有：（1）當能夠進行試驗的次數和能夠想象的值得思考的世界狀態都受限制時，認知進步不會起太大作用；（2）在進化隱喻的社會科學符號中，仔細區分拉馬克式的非生物過程和完全達爾文式過程所付出的努力可能不太恰當；（3）由於「幹中學」限制長期放鬆導致的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縮短了學習周期的真實時間；增加了強制試驗控制的機會；提高了個人和組織通過可控制試驗投資的能力；（4）在組織和文化歷史的任何一點，需要處理複雜技術和社會過程的理性經濟人，會依賴啟發法和決定規則，而這些規則通過建立某些模型使必要的「計算」成為可行。這三篇文章涉及的問題都屬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新領域，這是因為諾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定產生懷疑，開始思考認知、學習等問題，它們也就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主題。

總之，本書十四篇文章中的每一篇都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對新制度經濟學當前的前沿問題有一個明確的了解。雖然這本書的英文版已經出版6年了，但是他們所探討的問題仍然代表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最新前沿。正如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弗里基（John Ferejohn）教授在對該書的評價中所指出的，「實際上，這裏的每一篇文章都從較深的層次上原創性地探索了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對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如同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一樣，閱讀這本書都是一種智力享受。」但願該書也能夠成為每一個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的中國學者的智力享受。

李增剛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四期 2003年5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四期（2003年5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